

青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逻辑演进

乔茂林¹ 刘 旻²

(1.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北京 100032; 2. 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北京 100091)

摘 要:青年马克思介入世界历史理论之初,世界历史的客观进程和维科、伏尔泰、康德、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构成了其推进该理论的思想前提。正因如此,青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并非空泛的“世界视野”或“全球眼光”,而是包含着丰富的具体理论规范,这些内在密切联系的理论规范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梳理青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思想进程,把握其从一般性言辞到萌芽到初步形成再到正式确立的 3 次逻辑跃迁,构成了一种历史性解读路径,从而发现青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以新的方式提出并解决了旧问题。

关键词:世界历史;历史语境;逻辑跃迁;方法论;经济

中图分类号:A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8)06-0015-08

直面青年马克思之前的丰厚的世界历史理论资源,在宏观思想史语境的关照下,以微观视角考察青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复杂生成过程,可以发现,青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独特贡献,并非学界所认为的提出了新的世界历史理论问题,而恰恰是以新的方式提出并解决了旧问题,从而完成了世界历史理论的创新。那么,青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前人世界历史理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其具体理论规范是什么?其现实基础是什么?本文历时性梳理青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相关文本,就是对解答上述问题的一种尝试。

一、青年马克思探究世界历史问题的历史语境

人类历史进程和维科、伏尔泰、康德、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构成了青年马克思进入世界历史问题的现实与思想地平线。以 1500 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为标志,人类历史终结了此前各地孤立的阶段,进入了一般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时代^①。斯塔夫里阿

诺斯引用亚当·斯密观点,“发现美洲和经好望角至东印度群岛的巷道,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重要的事件”^[1]。地理大发现后人们从世界各地带来的知识对欧洲知识界而言,是震撼性乃至颠覆性的。詹姆斯等认为,15 世纪初期以降,欧洲知识界面前源源不断地涌现了大量新鲜资料,使他们应接不暇、争论不断。起初他们企图诉诸创世纪的神学传统来进行解释,费尽心力地“使他们对于地球的新发现和《圣经》相适应。但是,这些方法和传统变得一天天难以保持了”^[2]。

此后,产生了不少以整个世界为视野的历史著作^②,其中思想价值较大的有维科的《新科学》、伏尔泰的《论各国习俗和精神》《世界史》以及康德的《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史的理念》《人类历史的假想纪元》《永久和平论》。维科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划时代意义表现为在世界历史理论领域第一次提出了“人创世界”的观点,打破了中世纪的神创说,并以人为轴心将世界历史划分为“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在维科看来,人是精神和肉体

收稿日期:2018-05-15

基金项目:中央编译局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C15)

作者简介:乔茂林(1985—),男,内蒙古丰镇人,助理研究员,博士,从事马克思经典文本解读、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①之所以称之为一般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是因为与马克思在其世界历史理论中所揭示的以工业化为现实力量、以世界贸易为纽带、以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资本本性为动力、在此基础上人与人的真实密切联系的、资产阶级为主导的、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相对应的。

②本文不同意一般认为的黑格尔之前的世界历史著作只是指史料的堆砌,而黑格尔则以历史逻辑统摄了史料,这不仅贬低了黑格尔和其以前的历史学家,也无形中降低了站在巨人黑格尔肩膀上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应有思想深度,因此,马克思以前的世界历史理论需要花一定篇幅重新进行梳理。

的对立与统一,在所有博学者中,他最钦佩塔西佗与柏拉图。“因为这两个人都拥有一种高明无比的形而上学的智慧,塔西佗按人的实在的样子去看人,柏拉图则按人应有的样子去看人。”^[3] 伏尔泰在世界历史思想方面继承了维科的观点,反对神创世界,认为人才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传统神学史观局限于已知的人类活动范围,认为人们有着共同的起源与天然的联系,但是诸多曾经未知的人种随着地理大发现出现在欧洲视野中,这一范式的解释力度急剧下降,过去的世界史越来越丧失世界性了。伏尔泰从实证史料的角度、从不同地理位置的角度去具体地考察了不同人种所具有的不同的特征,认为“除了瞎子,没有人会怀疑白人、黑人、阿尔比诺人(Albinos)、霍屯督人、拉普兰人、中国人和美洲人是完全不同的种族”^[4]。正是基于这种人种差别,伏尔泰揭示了不同地区的人都各有其独立的起源,而这又与他们所处的独特自然环境密切相关,从而突破了神学“世界史”。世界历史走向与终点的理论,是康德在世界历史领域的重大贡献。根据人是人的最高目的的原则,他认为,建立一个普遍和持久的和平,是理性的最高目标。而这种永久和平的前提是,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普遍联合体的实现,公共法权的普遍概念使人不仅可以想到国家法权,而且还可以想到国际法权;“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法权势必把二者引向一种多民族的国家法权或者世界公民法权的理念”^[5]。在这样一个由世界公民法权保障的世界当中,自由得到了准确的规定与保障,人类的全部才智禀赋得以实现。

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划时代意义在于,明确了世界历史研究的方法论自觉问题,提出了“世界历史动力”问题与“世界历史的内在联系”问题,并以自己的方式给予了解答。黑格尔将历史研究方法划分为“原始的历史”“反思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在黑格尔看来,只有“哲学的历史”才能透过历史现象的“杂多”发现世界历史的“一”,即世界历史的动力问题,在此动力的推动下,历史展现为一个相互联系的运动变化过程。黑格尔这一思想对于世界历史思想的贡献正如恩格斯所言,“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6],也就是把世界理解成了一种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并试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关联。在黑格尔看来,在“哲学的历史”的方法论的视域中,历史是理性所把握的历史,世界历史产生于理性,是精神自我表现与自我实现的舞台,精神的本质是自由,因此,世界历史也是自由实现的过程。精神是世界历史的动力同

时也是世界历史的归宿,世界历史是世界精神自我实现的工具与手段,由于人类在具体的活动中“仅仅认得特殊性,而且只能支配特殊性”^[7],各民族与历史人物只是世界精神的无意识与不自觉的执行者。作为世界精神的代理结构的民族与代理人的英雄人物在世界历史的特殊活动中满足他们自身的欲望时,实现了世界精神的意图,而世界精神以他们非自觉的方式呈现在他们的意识之中。

我们看到,马克思在进入世界历史问题探究时,世界历史理论的五大核心问题已经被全部提出并解答,即世界历史动力问题、世界历史内在联系问题、世界历史主体问题、世界历史研究方法问题、世界历史走向问题,然而由于时代所限,这些解答甚至提问方式本身都采用的是非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路,因此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

二、青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从一般性言辞到思想萌芽的逻辑跃迁

马克思第一次使用“世界历史”这个概念是在1833年写作的《查理大帝》中,“在无穷无尽的世界历史上,他将永远不会被人遗忘,历史将为他编织一顶桂冠,这桂冠决不会淹没于时代的激浪。”^[8]在这首赞美查理大帝伟大心灵与不朽功勋的诗歌中,15岁的马克思展现了他博大的胸怀与磅礴的激情,但必须指出的是,世界历史在此时的马克思的语言中只是一个一般性的文学言辞,并未包涵世界历史理论的内在规范,因而是极度抽象的。

在1841年的博士论文中,世界历史这个词汇第二次在马克思文本中出现,“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从这种转变的一定方式可以反过来推论出一种哲学的内在规定性和世界历史性”^{[8]75}。我们看到,马克思此时的世界历史概念完全处在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笼罩之中,作为现实的世界完全被囊括在精神之中,世界历史进程不过是精神成为实践力量的过程,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8]75},虽然精神走出冥思之国走入精神之外的现实是一条规律,但这条规律只是心理学的规律,这种必然只是精神世界的必然,这种现实早已经内涵在精神之中,世界历史的进程只是精神外化的过程,世界历史的内部联系只是精神的内部联系。但我们同时应该看到,此时的马克思已经超越了在《查理大帝》诗歌中对精神和客观世界历史不做辨析的混沌使用方式,而是将精神与客观世界历史相分离,虽然仍然将客观世界历史归入精神,但是却包含着世界历史理论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突进的萌芽。

1842年,马克思第三、第四和第五次使用世界

历史概念,由于这3次使用的世界历史概念的内涵基本一致,因而我们将其置于一处进行研究。这3次世界历史概念的提出分别是,1842年3月到4月的《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马克思辛辣地指出,“上述那种新闻出版自由竟然妄图预测世界历史”^{[8]195-196},认为以这种虚妄的判断来压制人民的呼声,是非常荒谬的,因为人民才是作者“够资格”与“不够资格”的唯一评判者。1842年11月的《〈科隆日报〉的一个通讯员和〈莱茵报〉》,“如果使那些竭力把自己标榜为世界历史成果的空洞理论和现代学说的一般观点……当作批判的尺度而遭到悲惨的命运,那将会产生比一次变革更大的影响”^{[8]322},1842年12月的《论离婚法草案》,“正像世界历史会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已完全同国家观念相矛盾,以致不值得继续存在一样,一个国家也要决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现存的婚姻不再成其为婚姻”^{[8]348}。我们看到,虽然作为世界历史中现实个人意义上的人民仍然没有出现,但是作为“世界历史主体”的人民已经明确出现,人民是判断新闻出版标准的唯一评判者,政治决策必须符合人民的意愿。世界历史理论的来源必须是人民的现实生活,而非抽象的理论自身的构建,只有建基于市民交往和现实生活的世界历史理论,才有可能获得丰富内容,并对思想史产生影响。在这里,世界历史方向的问题,发展对于现存事物的裁决意义也已经提出。总体而言,马克思1842年对世界历史的理解已经超越了1833年到1841年一般性言辞的层次,世界历史理论的主体维度和世界历史的裁决意义已经抽象地提出,虽然这些概念尚未获得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层次上的世界历史理论内在规范,但提出人民、人民的生活、世界历史的裁决意义等观点,已经意味着青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开始从抽象思辨天国中走出。

在1843年5月到10月,马克思写下了被后人称为《克罗茨纳赫笔记》的重要文献,其中蕴含的重要思想,标志着青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从一般性言辞到理论萌芽的转折。带着《莱茵报》时期理论与实践的断裂所遭遇的困惑,马克思试图探求政治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并解答自己曾经坚信的黑格尔主义在现实中屡屡解释失灵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发现财产关系才是社会历史的真正基础,对法国波旁王朝的研究清晰地揭示了国家是由市民社会和所有制关系所决定的。马克思指出,法国在路易十八时代,宪法只是国王的恩赐,即钦赐宪章,而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关系发生了逆转,国王是宪法的恩赐,即钦赐王权,而当主语和谓语互换位置,

被决定者替代决定者时,会促成一次新的革命。马克思指出,当黑格尔把国家观念指认为主语,而把国家存在的旧形式变成谓语时,他本质上只是说出了时代的政治神学,而历史的真实情况恰恰与之相反,国家存在的形式才是主语,它决定了国家观念。马克思开始意识到市民社会和所有制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标志着他的世界历史理论从一般性言辞到理论萌芽的转折。

1843年10月,迁居巴黎的马克思开始潜心研究《克罗茨纳赫笔记》中的经济问题,写下了著名的《巴黎笔记》。在《巴黎笔记》中与世界历史理论关系最为密切的文本是标志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萌芽产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青年马克思在其中进一步摆脱了黑格尔主义的影响,走向了世界历史理论的独立研究道路。虽然马克思此时的世界历史理论依旧带有较为浓重的唯心主义色彩,但已经初步回答了世界历史理论的5个核心问题。关于世界历史的动力问题,马克思明确提出是工业生产力,这种工业技术的核心不仅在行业内部与行业之间引爆了革命,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同时造成了行业内部和行业之间更为密切的联系。例如,“如果工业获得雄厚的实力,像现在英国那样,那么工业就会逐步地迫使大地主把它的垄断针对外国”^{[9]364},世界之间的联系超越了曾经的政治和军事的链接方式,而走向了经济的内在联系。经济的内在联系还表现为,建立在工业社会之上的新型商业社会所必须的大量货币,“货币是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活资料之间的牵线人”^{[9]359}。马克思认为,如果货币能够把人同生活、社会、自然界联结起来,那么,货币就是所有纽带的纽带,它能够把一切纽带解开和联结在一起,所以它既是通用的分离剂,也是地地道道的粘合剂。

关于世界历史的主体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继承了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思路,认为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无产阶级兴起的前提,因为无产阶级并非自然形成,而是人工制造的贫民,是由于社会特别是中间阶级的解体而形成,当然,曾经的贫民如日耳曼的农奴也正逐渐成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无产阶级解决问题的方案是消灭私有财产:“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秘密”^{[9]213},因为无产阶级不是这个世界制度解体的预告,而就是世界制度解体本身。对于这一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做的推进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是详尽阐述了无产阶级的4种异化生存状态,二是将这一问题与世界历史的走向联

系在一起。其中,4种异化生存状态已经为马克思主义学界熟知,但值得我们特别重视的是,马克思将4种异化的根源追溯到了私有财产,认为消灭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实现人类解放,是世界历史的走向。马克思认为,把工人从私有财产中解放出来,从奴役制度中解放出来,不仅仅是解放工人,而是解放全部社会,工人解放是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因为工人的解放中,包含着人的解放,“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9]278}。可见,在《巴黎笔记》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世界历史的研究方法取得了重大进展,逐渐进入世界历史的决定性领域:经济领域,逐步走出唯心主义从概念到概念的研究方式,认为不能像国民经济学家那样,总是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来说明问题,而“这样的原始状态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我们且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9]267}

在对《巴黎笔记》时期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分析中,我们看到,马克思在新的研究方法基础上,对世界历史的动力、内在联系、主体和走向问题的理解与解答都有了重要的突破,但是其基本范式仍然处于人本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突进尚未完成时期。比如,他对作为世界历史动力的大工业,是从人的力量视角去解读的,认为工业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其历史与现存都已经成为了对象性的存在,是感性地摆在人类面前的心理学,而对这种心理学的解读依然停留在外在有用性的层次,至今尚未从它与人的本质的联系来理解,“因为在异化范围内活动的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9]306}。因而对世界历史主体的把握,是基于人的理想状态来进行的;对于共产主义作为世界历史走向的理解,仍然处于人本主义诗意想象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过渡阶段。

三、青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初步形成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青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实现了从萌芽到初步形成的逻辑跃迁。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跃迁是如何发生的?答案蕴含在被恩格斯誉为“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与《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之中。对全部历史唯物主义而言,这个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发生质变的第一个文献的价值不言而喻,可以

从诸多方面去总结,而其对于青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意义,则可以从“实践”与“人类社会”两个角度进行分析。《提纲》认为,人与环境、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实践就是这些活动的中介。旧唯物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10]499},唯心主义则抽象地发展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两者都没有从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去理解现实。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是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从这个角度来讲,世界历史的形成是人类物质实践长期积淀的必然结果,世界历史的共产主义归宿也必须以无产阶级的生产实践和政治斗争实践为中介才能实现。实践为青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超越人本主义范式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此外,马克思在《提纲》中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10]502}。也就是说,旧哲学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新哲学则站在了无产阶级的立场,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与改造建立在了实现全人类解放的高度上,从而为马克思在世界历史的主体和方向的问题上实现理论突破准备了思想前提。在同一时期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青年马克思丰富了世界历史理论在主体、内在动力、走向上的思想规定。马克思指出,李斯特以生产力的提高为资本主义辩护,并将资本主义设定为世界历史的终结是无法成立的。因为,这掩盖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残酷剥削的事实,生产力确实使人利用自然和社会的力量变得更为高效,但“它同样还在于使劳动更加便宜或者使劳动对工人来说生产效率更低了”^[11]。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在于,李斯特没有揭示生产力提高的真正源泉是无产阶级,但无产阶级却日益受到不断增长的生产力的压迫。无产阶级只有使生产力摆脱资产阶级的控制,纳入到全社会的安排之下,才能达到共产主义这一世界历史的真正终点。我们看到,青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并不是要反对生产力,而是要反对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形式,这是因为生产力发展作为世界历史的内动力,是无产阶级推动世界历史走向共产主义的必要前提。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青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初步形成的标志之一是方法论中研究对象的确立。他指出,世界历史问题的提出并不是从观念中得来的,不是从任何杰出的头脑中想象出来的,因为“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10]538},也就是说,青年马克思发现,世界历史已经是一个可以经验的事实了。这一方法论的重大突破是在对思想史的超越中完成的,

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德国观念论者研究历史的方法给予了彻底的批判,指出历史不是抽象思辨的宇宙精神或形而上学的意识运动,而是现实的变迁,因此,才“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10]519},这里的历史当然包括世界历史运动在内。青年马克思规定了进入历史研究的入口,这就是关于现实个人的论断,“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10]519}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就是他们,他们在获得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首先创造了人类自身,并将自己与动物区分开来。相对于全部历史,世界历史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是建基于现实个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过程,而且专指资产阶级开辟的世界紧密联系为一体的人类特定发展阶段,其必将走进共产主义社会。当然,这种世界历史的生产实践也是由现实的个人完成的,只是这种现实的个人,必须被资本人格化的代表资产阶级剥削来加以限定。因此,青年马克思才能在其个人思想史中首次给出关于世界历史的清晰界定,“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0]540-541}。他认为,英国发明的机器,如果能够夺走英国之外比如印度或中国劳动者的饭碗,并能够引起这些国家生存形式的变迁,那么英国的发明就是世界历史性的事实。正是基于这一方法论的突破,青年马克思才能对世界历史的动力、内在联系、主体、走向问题给出更为深入的答案,从而使其世界历史理论得以初步确立。

第一,关于世界历史的动力问题。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给出的答案是生产力。这里的生产力概念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作为人的力量的外化的工业生产力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它是生产技术即大工业生产力,其标志是“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10]565}。机器大工业所形成的生产力是世界历史的动力,机器大工业创造了现代交通方式与世界市场,它“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10]566}。借助这些力量,生产力突破了各民族之间的自然壁垒和人为贸易壁垒,由大工业生产所带来的各国之间空前的竞争导致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生产而采取关税措施,并在关税保护下大力发展本国大工业生产力,其最终结果是竞争加剧,大工业生产更加普遍化,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

史”^{[10]566}。大工业生产摧毁了各国闭关自守的自然状态,每一个人直接面对的不是原有的国家而是整个世界,这是因为世界历史中的文明国家的每一个人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大工业摧毁了原有的城乡结构,现代工业大城市取代了曾经的自然城市,以农村为基础的前世界历史被以现代大工业城市为基础的世界历史取代,“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10]566}。大工业以新秩序的扩展摧毁了或正在摧毁前世界历史社会的种种上层建筑,货币关系摧毁了人与人之间原有的温情脉脉的自然关系。

第二,关于世界历史内在联系问题。曾经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乃至幅员覆盖欧亚非的阿拉伯帝国,在世界历史理论初步形成的马克思看来,并不构成世界历史,因为不论其土地面积如何辽阔,其联系始终是依靠政治或军事的外在强制而非经济的内在整合。在马克思看来,以大工业生产为基础,世界历史形成的内在联系分为3个方面:一是由大工业生产带来的分工世界化;二是世界贸易;三是民族国家解体之后,人与人的新型关系。在机器大工业生产力大幅提高的推动下,原有的国内分工变为世界性分工,它与世界贸易共生共存,各国随着世界分工的深入,再也不能实现曾经的自给自足的愿望,而是更深深地依赖世界市场,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得个人逐渐无法脱离世界历史而存在,单个人原有活动性质的地域性被世界性取代,个人活动“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10]541},个人在世界市场的支配下,完全成为世界市场的一个零件,丧失了人本身所具有的个性和创造性,这同时也埋下了马克思提出新的世界历史走向问题的伏笔。大工业生产基础上的世界分工与世界市场消灭了民族的特殊性,人与人超越了曾经的民族性或血缘性关系而形成世界历史范围内的阶级。阶级内部利益与理想的一致性决定了阶级成员之间的相互认同,世界性的无产阶级的内在联系、世界性的资产阶级的内在联系以及他们之间的斗争关系构成了世界历史的内在联系。

第三,世界历史主体问题。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10]539},这是因为作为世界历史主体,无产阶级的诞生与成长就是与世界历史的展开同时进行的。无产阶级陷入绝境是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加剧了劳动与资本的隔绝,以至于到了不能满足劳动者最基本需求的程度,“由于竞争,他们不再是暂时失去作为有保障的生活来源的工作”^{[10]539},劳动——这个许多人的唯一谋生方式也无法继续保障

了。无产者被禁锢在无产阶级内部,丧失了转化为另一个阶级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无产者的生活条件,在世界历史的展开过程中已经变成了一种偶然的東西,不仅单个无产者是无法对其进行控制的,而且任何组织都对这种生存条件的控制无能为力。相比于曾在推进世界历史进程方面起过革命作用的资产阶级还在维护民族利益这种世界历史进展中的特殊性,大工业创造的无产阶级已经消灭了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任何一种特殊利益,无产阶级那里只存在普遍性,这是因为,作为世界历史主体的无产阶级是一个“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10]567}。

第四,世界历史走向问题。关于人类社会走向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曾明确提出“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0]539}。强大的世界市场使得所有人的关系变成了依存关系,虽然这些强大的力量原本是人们创造出来的,但是这些原本属于人的力量完全变为了人的异己力量,威慑着和驾驭着它们原本的主人,作为世界历史走向的共产主义则以革命的方式,“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①。这场革命是漫长的,革命的结果是重新控制原本属于人的生产力和取得无产阶级替代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体地位。这就需要无产阶级能够联合起来,通过大工业创造出来的城市和廉价便利的交通,来超越“同这些孤立的、生活在每天都重复产生着孤立状态的条件下的个人相对立的一切有组织的势力”^{[10]568}。那么无产阶级能够联合起来吗?马克思对此给予了完全肯定的回答:“由于无产阶级本身固有的本性,这种联合又只能是普遍性的”^{[10]581},在共产主义革命事业中,“一方面迄今为止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权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权力被打倒,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普遍性质以及无产阶级为实现这种占有必需的能力得到发展,同时无产阶级将抛弃它迄今的社会地位遗留给它的一切东西”^{[10]581}。

四、青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正式确立

《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对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丰富和剩余价值秘密的初步揭示为进一步丰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提供了思想资源。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用更为准确的“生产关系”取代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交往形式”或“交往关系”概念,而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则明确指出,“资本也是一种社会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10]724}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以“分工”取代了“异化”,为突破人本主义范式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是由于当时他对资本主义具体生产过程的研究尚未深入,因此,这一重要概念依然带有抽象性。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对分工的抽象理解时,开始逐步走出此前的泛分工论。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历史唯物主义中经济要素进一步增强,马克思第一次明确提出,要以“构成现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10]711}为研究核心。上述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丰富,为青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方法论的明确提出奠定了基础。剩余价值理论被恩格斯誉为马克思毕生两大重要发现之一,其重要性在于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它决定着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发展的全部过程。《哲学的贫困》明确反对蒲鲁东关于“价值的剩余”的必要前提是普罗米修斯的第二次创世纪的观点,而认为其前提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条件,即建立在阶级对抗、现代分工、资本积累、雇佣劳动制度和工厂之上。《雇佣劳动与资本》则说明了剩余价值的源泉,认为工人的创造“不仅能补偿工人消费的东西,并且还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10]726},实际上揭示出雇佣劳动是剩余价值的源泉。我们认为,《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所初步揭示的剩余价值的秘密,进一步论证了无产阶级作为世界历史主体的地位,因为他们为全人类贡献了生活资料,自己却深受压迫和剥削;也为世界历史的共产主义走向的必然性提供进一步的证明,因为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需求是无限的,一定会不断积累资本扩大再生产,而无产阶级却日益贫困,从而造成生产相对过剩并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种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解决。

我们认为,青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正式确立的标志是《共产党宣言》,这是因为,他找到了通往作为世界历史终点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现实道路,其他世界历史理论的思想要件也进一步发展。第一,世界历史方法论的明确提出。恩格斯在1883年从方法论高度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进行了总结,尽管这本著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完成的,但恩格斯强调这些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12]9};全部人类社会包括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政治和精神的基础是该时代的经济生产“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12]9}。马克思在《共产

①这种力量就是大工业生产以及在其基础上的世界市场。

党宣言》中完整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导致的阶级结果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精神现象,换言之,经济基础(经济生产、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政治、精神)的完整提出。他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导致生产关系和所有制的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取代封建所有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以公有制取而代之,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才能最终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在此方法论下,资产阶级所开创的世界历史时代,是以大工业经济生产为基础的,由此才展开了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对立,并产生了新资产阶级统治世界的政治与世界历史思想。在业已形成的世界历史的基础上,无产阶级根本反对的并不是站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的资产阶级,而是要彻底推翻一切阶级统治,要消灭阶级本身,从而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斗争、压迫和剥削,换言之,无产阶级只有使全人类获得解放它自身才能得到解放,共产主义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后的世界历史的必然走向。

第二,世界历史主体从无产者到无产阶级特别是再到其政治组织的共产党。关于无产者到无产阶级的历史进程,马克思在之前的文本中已经多次提及,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历史性地清晰描述,特别是第一次提出了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为实现世界历史的终极目标即共产主义找到了主体性向度的保障。马克思认为,现代工人(无产者)由于与资本的彻底分离,除了工作之外他们没有任何生存的办法,因此在客观上已经沦为了商品。“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12]38}。无产者在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历史中成长为了无产阶级,换言之,一部无产阶级形成的历史就是一部无产者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历史。“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12]39}。最初的斗争只是在单个工人与单个资产者之间进行,后来由某一个工厂向某一地方乃至某一劳动部门演变,他们的斗争对象不仅包括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而且包括生产工具。这个阶段,无产者处于全国性分散状态,无产阶级这时的集合并非是为了自身的政治目的,而是资产阶级为了本阶级的政治目的将他们发动了起来,“整个历史运动都集中在资产阶级手里,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12]39}。无产阶级规模的急剧扩大、机器生产导致劳动差别的日趋缩小引起的无产阶级内部利益越来越一致、机器的改良导致的工人生活基本保障的严重不稳定,使得单

个工人与单个资产者之间的斗争性质向两个阶级之间斗争转化。工人阶级借助大工业造就的发达交通工具,将各地工人联合起来,地方性斗争由此演化成全国性斗争。“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12]40},这个政党就是共产党。共产党组织的产生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客观运动的必然结果,共产党的理论并非某个人思想的特殊产物而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观念上层建筑。共产党与无产阶级的利益完全一致,共产党与其他工人阶级的政党的根本不同在于,共产党不区分不同民族的利益,并且在革命中始终代表无产阶级的全部利益,“这就导致了共产党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12]44}。从无产者到无产阶级再到共产党的诞生为实现世界历史的终极目标即共产主义提供了主体性向度的保障。

第三,对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的世界历史动力与内在联系问题给予了清晰的解答。如上文所述马克思关于这两个问题有过一些片段性解答,比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其动力来源指认为机器大工业生产,这当然是抓住了世界历史形成的内在动力,而关于这个内在动力产生的外因,内外因素的相互关系,以及资产阶级如何成为这个内在动力的代表等问题,马克思则是在《共产党宣言》中才做出了清晰的历史性阐述。世界历史形成的动力与内在联系来自“封建的所有制关系,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12]36},由此诞生出新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随后的世界性扩散。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欧洲晚期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日益发展,资产阶级分子在城关市民等级中产生了。发现新大陆与成功绕过好望角使得欧洲封建社会的解体急剧加速,行会的生产方式远远不能满足新型市场的需求而逐步被工场手工业取代,工场手工业也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世界市场而又迅速被机器大工业取代,以大工业为基础,世界市场正式确立,“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12]32}。伴随这一历史进程,现代资产阶级也随着壮大起来,他们本身就是这一历史进程的产物,是生产和交换方式一系列变革的产物,随着工场手工业取代行会后又被机器大工业取代,机器大工业中的产业大军首领资产阶级诞生了。作为新生产力代表的资产阶级不断开辟世界市场,将各个民族国家的生产与消费纳入了世界历史的活动之中,资产阶级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原料来自世界各地、产品供世界各地消费,民族自给自足的状态被彻底打破,代之以相互需要和相互依赖。作为上层建筑的精神产品的民族性也被消灭

殆尽,代之以新型的世界性文学。世界人口日益密集起来,世界财产日益聚集在少数人手里,集聚经济活动使得政治组织联系日益紧密,原本在利益、法律、关税、法律均不相同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日趋密切地结合为拥有统一的政府、法律、利益、关税的民族。

第四,对作为世界历史走向终点的共产主义社会有了规定性的阐释。在《共产党宣言》中,除了上述共产主义现实的主体性保障以外,马克思对作为世界历史终点的共产主义社会从基础和革命对象以及共产主义本身描述3个方面进行了规定性阐释。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基础,共产主义不是特殊的解放,而是全人类的解放,必然是一个世界历史性事业。世界历史的形成加速了普遍的交往和竞争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为世界历史走向终点进入共产主义提供了物质基础;与此同时,世界历史的发展加剧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从而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马克思首次完整规定了作为世界历史走向的共产主义革命对象: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形成的所有制关系、雇佣劳动和资本关系、教育、家庭、民族国家以及宗教哲学。其中,消灭私有制是最核心的问题,因为私有制是其他内容的核心,正是因为私有制使资本和劳动相分离,剥削才成为可能,劳动成为了谋生的手段,人的独立性和个性被摧残乃至消灭;这种社会关系下的教育是把绝大多数人训练成机器的劳动培训。作为世界历史终点的共产主义的内在规定性,首先是将私有财产的阶级性质彻底改造,变为全民公共所有制,属于社会全体人民的财产是建立“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12]45}。财产一旦失去了它的阶级性质,那么使劳动变为资本、货币、地租的现实基础将消失,劳动将恢复其应有的人的第一需要特性,人将恢复其自由独立的特性。财产的公有制将使得原有教育摆脱为资本服务培训劳动力,转变为社会教育。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反对共产主义的理由是不成立的,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种种观念均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12]48},资产阶级将历史性的关系变为了理性规律和自然规律,这是因为现有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最符合他们的利己本性。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性是“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2]53},其他的规定性包括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在财产公有制基础上的自由劳动和社会教育。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世界历史的终点,换言之,共产主义社会在更高层次上恢复了世界历史的开放性与历史性。

参考文献:

[1]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下册[M]. 董书慧,王昶,徐正源,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05.

[2] 普雷斯顿·詹姆斯,杰弗雷·马丁. 地理学思想史[M]. 李旭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115.

[3] 詹巴蒂斯塔·维科. 新科学[M]. 朱光潜,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602.

[4] VOLTAIRE E. The best known works of voltaire[M]. New York:Blue Ribbon Books,1927:373.

[5] 康德. 康德著作全集:第六卷[M]. 李秋零,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21.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90.

[7] 黑格尔. 历史哲学[M]. 王造时,译. 北京: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6.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63.

[1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许宇鹏)

